第 34 卷 第 1 期　　财经研究　　Vol. 34 No. 1
2008 年 1 月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an. 2008

公允价值的实证理论分析与中国的研究机遇*

刘　浩，孙　铮
（上海财经大学 会计与财务研究院，上海 200433）

摘　要：文章在分析了西方（主要是美国）和中国对公允价值的实证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在新会计准则颁布后，中国会计学术界对公允价值的研究机遇。我们认为，在中国特有的制度背景下引入公允价值，将对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产生深刻的影响。对于西方高度发达的资本市场中的投资者而言，决策有用信息的直接表现就是信息观——公允价值会计信息和股票价格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而在中国转型经济的研究中，公允价值在契约有用性方面，将更有可能获得突破性的发现。

关键词：公允价值；实证研究；价值相关性；契约有用性

中图分类号：F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08)01-0083-11

从 2007 年 1 月 1 日开始，中国所有的上市公司开始采用新会计准则，这标志着中国企业的会计准则与国际准则基本趋同，其中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大量使用公允价值。随着公允价值数据的披露，我们有更多的机会了解中国上市公司的实务，这同时也为中国会计学术界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研究机遇。

本文首先分析了国外（特别是美国）对公允价值的实证理论研究，并简要阐述了我国已有的公允价值实证研究成果。最后讨论了在新会计准则颁布后，在中国特有的制度背景下，中国会计学术界的研究机遇，并分析可能形成突破的着力点——公允价值的契约有用性。

一、对已有公允价值实证研究的分析

按照 Beaver（1989）的观点，会计信息的最高目标是决策有用性。Beaver 认为决策有用性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估值有用性，即会计信息有利于投资者

收稿日期：2007-09-14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0473055）；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07EJB003）

作者简介：刘　浩（1978－），男，陕西咸阳人，上海财经大学会计与财务研究院专职研究员，博士；
孙　铮（1957－），男，上海人，上海财经大学会计与财务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的估值决策;二是契约有用性,即会计信息要有利于缔约,特别是投资者和管理者之间的缔约。

如果说提供更为决策有用的会计信息是使用公允价值的主要理由,那么学术界异常关心的是:在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获取公允价值,并将其入账后,是否取得了理想的效果?这个问题需要实证研究来回答。根据美国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的《财务会计概念公告》第7辑"在会计计量中使用现金流量信息和现值"的观点,在难以获得市场交易价格的情况下,现值是获取公允价值的重要方式。作为与历史成本相对应的概念,现有西方和国内文献中研究的公允价值通常是指用现值计量的项目。

(一)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公允价值实证研究主要关注估值有用性

与传统的计量模式相比,公允价值(以现值为代表)的使用是为财务报表的使用者提供与当期价格更为接近的信息,对于西方高度发达的资本市场中的投资者而言,由于财富的主要表现形式体现在证券的价格上,决策有用信息的直接表现就是该信息和股票价格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这也直接导致估值有用性几乎是西方会计学术界最为关注的领域。而从契约有用性出发对公允价值的直接研究相对较少。

1. 公允价值的价值相关性研究

价值相关性研究主要是检验股票价格(或股价的变化)与特定的会计数字之间的关系。由于美国资本市场对股票价格的敏感性,以及相关数据易于取得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价值相关性研究颇受众多美国会计学者的关注。尽管对于价值相关性研究能否为会计准则制定者提供帮助存在着争议(Holthausena和Watts,2001;Barth、Beaver和Landsman,2001),但是价值相关性却是目前美国学术界对会计盈余及其组成部分是否对投资者有用的主要研究方向。

围绕着FASB采用公允价值的各个会计准则,美国会计学界进行了集中的研究。

(1)通货膨胀会计中的重置成本。20世纪70年代美国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在1976年发布了《会计系列文告》(ASR,accounting series release)第190号,要求上市公司在补充披露中披露重置成本变动的影响。SEC的举措迫使FASB在1979年发布了33号准则要披露通货膨胀下的稳值信息(Constant dollar,又称不变美元信息)②。

由于学术界对于重置成本有着巨大的争议,以及当时除历史成本以外的其他计量方式比较少见,因此上述准则的颁布立刻获得了学术界的关注。最早期的研究结论发现,披露的重置成本信息并未比历史成本信息具有更多的股票价格相关性(Beaver、Christie和Griffin,1980;Gheyara和Boatsman,1980;Ro,1980),在修正了前述研究中的一些小的计量方法的缺陷后,Beaver、Griffin 和 Landsman(1982)，Beaver 和 Landsman(1983)，Ohlson(1985)支持了前述结果。但另一些研究则发现重置成本信息还是有一些增量的信息含量，尽管其中的关系较为微弱(Bublitz、Frecka 和 McKeown，1985；Murdoch，1986；Haw 和 Lustgarten，1988)。

上述研究结果说明，在 20 世纪 70 年代重置成本能够提供更有用信息的结论并未获得普遍认可。

(2)储备确认会计(RRA，reserve recognition accounting)。SEC 在 1978 年发布的 ASR 第 253 号中，要求美国的石油公司采用现值会计 RRA，这样石油公司持有的油气资产要用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确认。在 20 世纪 70 年代石油危机的背景下，大型石油公司持有的油气资本利得非常高，从而激起了民众对石油公司"暴利"的愤怒。在石油公司的政治游说下，SEC 放弃了直接在报表中用现值计量的要求，FASB 在 1982 年通过了 69 号准则，在报表中使用历史成本，并规定了"从事油气生产活动的综合披露包"来反映现值。

Bell(1983)发现尽管 RRA 可能不够精确，但是在石油公司公布 RRA 信息的视窗内，还是普遍获得了正的股票非正常回报。Dharan(1984)发展了预期模型，发现 RRA 信息对观察到的股票价格具有很低的增量信息含量，并认为这主要是 RRA 信息的预测误差过大所致。Magliolo(1986)调查了 1979～1983 年的样本公司，并未发现 RRA 信息可以较投资咨询公司提供更相关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的市场价值信息。Harris 和 Ohlson(1987)研究了 1979～1983 年的样本，发现历史成本较 RRA 信息对资产的市场价值有更强的解释力。Doran、Collins 和 Dhaliwal(1988)发现，1979～1981 年间历史成本和 RRA 信息对股票市场的超额回报都有显著的解释力，但是在 1982～1984 年间，两个变量却都没有显著的解释力。

可以看到，在 20 世纪 80 年代，公允价值信息在价值相关性方面占优的结论并不一致。

(3)金融工具会计。FASB 对金融工具采用公允价值，经历了从表外披露逐渐过渡到表内计量的过程。例如 1991 年的 SFAS 107 要求所有企业在财务报表或附注中披露相关金融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1994 年的 SFAS 119 要求披露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SFAS 115、SFAS 33、SFAS 137 则要求主体对公允价值进行表内计量。

对金融工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行业特别是银行业。Barth (1994) 以银行为样本选取了 1971～1990 年的数据，研究发现披露投资性证券的公允价值相对于历史成本而言，对银行股票的价格具有更强的解释力。Nelson(1996)的研究显示，贷款、存款、长期债务和表外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披露并没有增量的解释力，但投资性证券的公允价值相对账面价值具有增量的解释力。然而在控制了公司盈利指标以后，投资性证券公允价值的相关性就很微

弱了。Eccher、Ramesh和Thiagarajan(1996)发现,证券、净贷款、长期债务和市场相关的表外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与股票价格都具有相关性,而且公允价值对历史成本有增量的解释力。但是这种解释力在1993年降低了,作者认为这是源于日益增长的公允价值的计量误差。Barth、Beaver和Landsman(1996)发现,在控制了未完成贷款、利率敏感性资产和负债后,市场对贷款的公允价值作出了反应。其他国家的研究也支持了美国的发现。Bernard、Merton和Palepu(1995)对丹麦的银行和储蓄机构(banks and thrifts)进行了调查。由于丹麦要求上述金融机构采用"市价会计"(mark-to-market accounting,又称按市价计量的会计),这样丹麦实际上比美国更早采用了公允价值。研究发现市场价值金额比按照历史成本计量的金额更能反映公司价值的变化,当然不可避免的是收益的波动性较大。

对金融工具的研究表明,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金融工具的普及,实证研究支持了FASB在1998年颁布的针对衍生金融工具和套期业务的133号准则中的观点:公允价值是金融工具最相关的计量属性。

(4)其他资产的公允价值会计。其他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计量在美国会计实务中主要出现在披露中,不允许进行账务处理,因此关于账务处理的主要研究集中在其他国家。在英联邦国家如英国和澳大利亚,长期资产的重估是被允许的。Easton、Eddey和Harris(1993)调查了澳大利亚的长期资产重估,发现包含了资产重估值的净资产价值与不包含资产重估值的净资产价值相比,具有更显著的价值相关性。Barth和Clinch (1998)同样研究了澳大利亚的资产重估,发现重估的金融资产、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都具有价值相关性。其中无形资产的价值相关性取决于其收益期和持续性。不动产、厂场和设备(PPE,property,plant and equipment)三者中,厂场和设备的价值相关性要强于不动产,作者认为,这体现了经营性资产比非直接经营性资产的价值相关性更高。Danbolt和Rees(2007)以英国的房地产和投资基金两个行业作为实验的基础,比较了历史成本会计和公允价值会计,发现公允价值收益比历史成本收益具有更高的价值相关性。房地产行业的价值相关性要低于投资基金,并且表现出受盈余管理的影响更大。

2. 公允价值计量的可靠性研究

虽然会计准则中大量要求采用公允价值,但是公允价值计量的可靠性却是理论界怀疑的对象。

较早探讨公允价值估计误差的正式文献是由Barth(1991)提供的,作者比较了美国公司养老金资产和负债的几种度量方式,考察哪种方式最能体现投资者的评价。研究发现养老金资产的公允价值和所有的三种允许披露的养老金负债的计算结果,比FASB颁布的87号准则确认的金额计量误差更小。Barth和McNichols(1994)调查了美国公司对1 156家排污点(Superfund

Sites）所确认的环境负债，并估计市场对于公司未确认的环境负债的评价，结果未确认的环境负债平均高达公司市价的28.6％。Muller III（1999）研究了英国公司购入商标时资源确认的价值，发现由于伦敦证交所鼓励对商誉尽快冲销，从而导致了英国公司愿意从商誉中将商标的价值分离出来。Aboody、Barth和Kasznik（1999）发现，英国公司对于固定资产的重估值的改变与公司未来业绩的改变方向是显著一致的，这说明英国公司的资产重估可靠性还是较高的。

Sloan（1999）对前述的研究方法提出了质疑，认为用以后年份的股票价格和经营业绩来判断当期的公允价值估值是否准确，这种处理可能是不恰当的，因为以后年份的股票价格和经营业绩受到影响的因素非常多。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Dietrich、Harris和Muller III（2000）在研究英国公司年报中关于投资性房地产估值可靠性的时候就改变了方法，他们发现年报中披露的公允价值估值普遍低于以后实际的销售价格，但是公允价值较历史成本而言具有更小的偏差。

3．不同法律环境对公允价值执行效果的影响——契约观的触及

不同法律环境对于相似会计准则的运用效果是有一定影响的，特别是在需要借助职业判断斟酌公允价值的时候。这方面的研究虽然较少，但是对于理解公允价值的实际应用却非常有帮助。这也是触及到契约观的少量文献。

Ball、Robin和Wu（2003）利用Basu（1997）模型，研究了中国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的会计准则，发现尽管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会计标准受到过去殖民地历史的影响而与英、美的会计标准类似（包括公允价值的使用），但是由于其经理和审计人员报告财务信息的激励机制与英美具有较大差异，从而产生了较英美本土质量偏低的会计信息。

（二）中国学者对公允价值的已有实证研究以模仿西方的估值研究为主

中国会计准则长期以来坚持历史成本计价，对公允价值的采用非常谨慎，实务中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较少。因此对公允价值的研究以规范性研究居多（黄学敏，2004；路晓燕，2006），实证研究的文献较少。

已有文献中少量涉及到公允价值的内容，主要集中在A股和B股、A股和H股的会计盈余的差异比较方面（李树华，1997；李东平，1999；Chen，Gul和Su，1999；蒋义宏，2002）。

其中有代表性的是邓传洲（2005），作者研究了B股公司按国际会计准则第39号披露公允价值的股价反映，发现按公允价值计量的投资持有利得（损失）具有一定的增量解释力，而投资的公允价值调整没有显示出价值相关性。王跃堂、周雪、张莉（2005）研究了中国上市公司的长期资产减值行为，发现减值总额真实反映了长期资产未来收益能力的下降，而且追溯调整后计入当年损益的减值数额也真实反映了长期资产未来收益能力的下降，从而证实了中

国上市公司长期资产减值体现了公允价值。

受到研究数据和研究环境的局限，中国学者对于公允价值的实证研究总体上还处于模仿的阶段。

二、新准则下公允价值的研究机遇

2006年新颁布的会计准则从2007年1月1日起在上市公司中率先实施公允价值，在这次新准则中，对于公允价值的较大范围的使用引起了关注。例如在首次执行并需调账的15项业务之中，涉及公允价值的竟有13项。

会计准则强制上市公司大量使用公允价值，这就从数据上为中国的公允价值研究提供了基本的材料。但对于中国会计学者而言，如果只是模仿西方已有的文献，可能至多是用中国数据“炒冷饭”，因而要有高质量的研究，还需要仔细探讨对公允价值的研究路径。

孙铮、刘浩(2006)指出，在中国进行原创性的研究，独特的制度背景是需要首先考虑的因素。已有的大量研究文献说明，有四类因素是我们在会计实证研究中是不可忽视的：1)中国的市场化程度虽有较快发展，但仍处于较低水平，同时地区间差异较大；2)产权法律保护体系虽然不断健全，但依然比较薄弱；3)公司治理水平继续得到提高，但仍不完善；4)政府行为虽然得到了进一步规范，但对微观主体运行的干预却仍较为强势。

在这样独特的制度背景下，我们认为时代已经赋予了中国会计学者做出高质量的实证研究成果的机遇。

由于美国股票市场较为发达，研究依据的是计量观——即公允价值是否比历史成本更具有价值相关性，而在北美法治环境较为完善的大背景下，忽视了对公允价值产生的基础——公平所依据的契约观作用的研究，因为公平交易已成为整体社会交易的常态，会计问题仅仅集中在报表是否能充分计量方面。

而在当前经济转型快速变迁而又缺乏良好产权保护的中国新兴市场经济中，不公平交易(例如关联方交易)的比重较高，恰恰可以对契约观进行仔细的观察，从而可能取得对公允价值研究的突破性成果。

我们对新准则下公允价值实证研究的可能路径设计如图1所示。这个实证研究的可能路径从与公允价值有关的会计实证理论的两个方向分别展开：一是估值有用性；二是契约有用性。我们认为，在这两个方向中，公允价值计量的经济后果，特别是契约有用性或许是中国最有可能取得突破性进展的研究领域。

(一)估值有用性

前面指出，国外与公允价值有关的主要研究文献一般都是围绕价值相关性而展开的。我们认为该类研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中国，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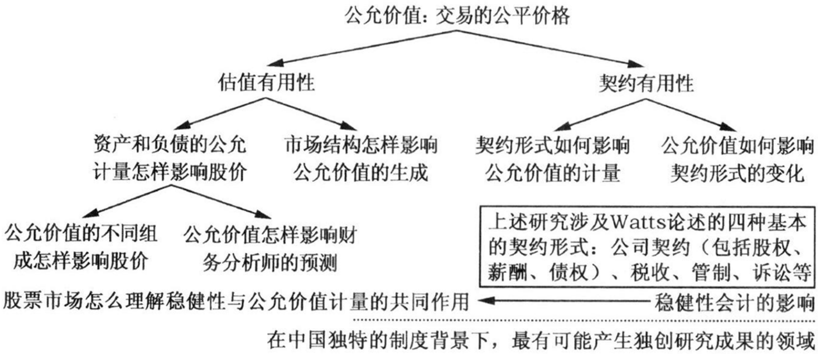

图 1　新准则下公允价值的实证研究的可能路径

我们把估值有用性的研究分为两个相对应的方面：一是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估值怎样影响了股票的价格；二是随着市场架构的改变，市场化的发展怎样影响公允价值的计量，特别是第二个方面是美国研究所不具有的。

1．公允价值计量怎样影响股价

根据 Felthem 和 Ohlson(1995)的观点，如果公司的报表主要采用公允价值计量，那么股价将主要由公司净资产的账面价值来反映。我们可以利用中国的数据对上述观点进行检验。

(1)公允价值信息是否和公司的股票价格更加相关？不同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计量是否和股票价格有不同的相关性？公允价值信息披露的详细程度是否会影响公司的股票价格？虽然公允价值计量不影响公司的现金流，但是会影响利润，进而影响公司的股利分配和财务决策，这对于投资者的判断是否有影响？

(2)考虑到财务分析师对公司股价日益重要的影响，公允价值作为公司对于资产计价的选择，是否会改变财务分析师的看法，从而影响到财务分析师的预测？

2．市场结构的变化怎样影响公允价值的生成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资产和负债的定价方式越来越市场化。而原有的一些不规范的定价机制也在逐渐优化，从而使市场在公允价值定价中扮演的角色一直在变化。典型的问题是公司在股票市场上交易性投资的定价。一方面股改使大量的股权获得了市场价格，从而解决了同股不同价的问题；另一方面大量机构投资者的进入，使得股票市场中的定价机制从散户投机为主变为以价值投资为导向，从而保证了股票市场的稳定。这种市场结构的改变，使得交易性投资资产的公允价值较以往更为容易取得，也更加稳定可靠。

关于市场结构的变化如何影响公允价值生成的问题，不断发展的中国市场经济给我们提供了有效的研究背景。

(二)契约有用性

公允价值对契约有用性的研究在国外并不多见,但是我们认为,在中国可能会出现重要的研究成果。这类研究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契约形式如何影响公允价值的计量,二是公允价值的计量如何影响契约形式。

根据Watts(2003)的观点,影响公司的契约主要有四种形式:1)公司契约(包括股权、薪酬、债权);2)税收契约;3)政府管制契约;4)诉讼类契约等。

这四类契约形式和契约中运用的会计信息,特别是公允价值信息,将形成复杂的交互关系:一方面是不同的契约形式如何影响公允价值的计量;另一方面是公允价值的使用又如何影响到契约形式的变化。

1. 契约形式如何影响公允价值的计量

为了满足不同契约形式的要求,契约的签订方可能会采用公允价值以满足契约中的条款。具体研究的问题包括:1)不同的股权结构可能会影响到公允价值的计量,例如,以国资股为主要股权的公司是否偏好于公允价值计量以满足国资运作绩效的考核,而民营持股公司是否更愿意用历史成本以掩盖真实的财务盈利;2)不同的薪酬契约可能会影响到公允价值的计量,例如当公司的利润指标包含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时,经理人员可能更倾向于多做股票投资并及时将持有利得入账;3)不同的债务契约可能会影响到公允价值的计量,例如在债务契约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经理人员可能利用资产的公允价值升值来掩盖资产流动性的实际降低;4)虽然所得税征缴过程中应纳税所得是独立的,但是在所得税基仍然依赖于公司会计信息的情况下,以及流转税的征缴依赖于公司发票上的价格而不是现值的情况下,企业可能为了躲避税收而拒绝采用公允价值;5)在政府管制较严的情况下,例如石油、电力等垄断性行业,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将可能进一步暴露利润,如果政府对高利润行业进行严格管制,这些行业可能拒绝采用公允价值;6)由于公允价值计量将更有可能招致诉讼中法官的拒绝,在面对诉讼的时候,企业可能会采用保守的历史成本。

2. 公允价值如何影响契约形式的改变

一般来说,契约的签订要依赖会计信息,但是当会计信息度量成本过高或可靠性较低的情况下,契约的签订就可能使用其他更可靠的度量手段,例如放弃对利润的使用而直接使用生产数量。这方面研究的问题包括:1)一家公司在公允价值度量情况下,如果净利润发生变动,公司的分配政策是否会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公司的投融资决策?2)如果公司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净资产发生变化是否会引起股权结构的变化?3)当营业利润中包含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情况下,董事会如何考核经理人员的业绩?是否会将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剔除?是否要辅助其他的考核指标?4)在公司资产的公允价值远高于历史成本的情况下,银行抵押贷款的发放将依据于历史成本还是公允价值?5)面对不同行业按照自身的利益而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政府将如何进行有效的监管?6)法

院将如何应对公允价值的民事纠纷?如果公司间交易的是特殊商品,公允价值难以取得,而小股东认为经理层认定的公允价值不适合,法院将如何判断?

上述问题,在中国产权法律保护比较薄弱、政府干预较为严重、关联方交易又较多的情况下,可能会形成一些非常有意义的研究成果。

(三)稳健性会计与公允价值计量的关系

稳健性是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重点,特别是 Holthausena 和 Watts (2001)、Watts(2003)进一步推动了该研究的发展。我们认为公允价值计量可能为稳健性的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稳健性主要体现在尽早确认损失而推迟确认利得,高估负债和低估资产。FASB 在《财务会计概念公告》第 2 辑"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1980)中,将稳健性视为一种惯例(Convention),而非一项原则(Principle)。虽然稳健性受到了诸多批评,认为可能导致会计数据的扭曲,但是 FASB 也认识到稳健性的合理之处:"在财务会计和报告中,也存在稳健性的合理位置,因为商业和经济活动中充满了不确定性,但需要慎重运用。"只是这样的理念与公允价值计量的理念是不甚相同的,公允价值要求在对称的情况下公平反映企业资产和负债的价值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企业损益的波动。

在目前稳健性会计与公允价值双重影响作用下的会计实务,将给学术界带来怎样的研究启发呢?我们认为至少需要进行如下几个方面的研究:

(1)股票市场如何理解稳健性会计与公允价值的双重作用。虽然利润的改变并不影响现金流,但是可能会影响投资者的预期。稳健性会计与公允价值的作用可能是相反的,那么投资者如何理解二者的共同作用?如果考虑到稳健性所依赖的诸多契约,例如银行债务契约的限制,这种影响可能就更为复杂。

(2)会计实务中如何权衡稳健性会计与公允价值计量。在股票市场和内部管理等多方压力下,公司管理当局会对稳健性会计与公允价值计量进行微妙的权衡,从而保证公司利润的平滑,这将使得公司的决策过程更为复杂。

上市公司的报表将是上述诸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需要我们仔细区分各种影响因素,从而得到更加扎实的研究成果。

我国学者近年来实证研究水平正在不断提高,并且对国际学术界正在产生一定的影响,我们期待着具有原创意义的、源于我国实践背景的公允价值实证研究成果的问世,为我国会计准则的建设和会计实务的改进做出重要的学术贡献。

---

* 本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批准号05JJD63002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同时得到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以及上海市"晨光学者"项目的资助。

注释:

①Holthausena 和 Watts(2001)指出价值相关性研究所依据的理论不能解释会计实务,对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作用非常有限。但是研究价值相关性的几位重要学者 Barth、Beaver 和 Landsman(2001)指出,鉴于权益投资者是资本市场的主体,价值相关性研究的文献对准则制定还是具有重要帮助的。

②随着美国通货膨胀受到控制,通货膨胀不再成为实务界的热点,1986 年 FASB 发布了 89 号准则替代 33 号准则,不再强制而只是鼓励披露物价变动信息。

参考文献:

[1] Aboody D , Barth M E , Kasznik R. Revaluations of fixed assets and future firm performance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1999,26: 149～178.

[2] Ball Ray, Ashok Robin, Joanna Shuang Wu. Incentives versus standards: Properties of accounting income in four East Asian countries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3,36: 235～270.

[3]Barth M E. Relative measurement errors among alternative pension asset and liability measures [J]. The Accounting Review , 1991,66: 433～463.

[4]Barth M E. Fair value accounting: Evidence from investment securities and the market valuation of banks [J]. The Accounting Review , 1994,69: 1～25.

[5]Barth M E , Beaver W H , Landsman W R. Value-relevance of banks fair value disclosures under SFAS 107 [J]. The Accounting Review, 1996,71: 513～537.

[6]Barth M E , Clinch G. Revalued financial,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assets: Associations with share prices and non-market-based value estimates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 1998,36: 199～233.

[7]Barth M E , Maureen F McNichols. Estimation and market valuation of environmental liabilities relating to superfund sites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1994,32: 177～209.

[8]Barth Mary E, William H Beaver,Wayne R Landsman. The relevance of the value relevance literature for 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 setting: Another view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1,31: 77～104.

[9]Beaver W H, Christie A A, Griffin P A. The information content of SEC accounting series release No. 190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 1980,(2): 127～163.

[10]Beaver W H, Griffin P A, Landsman W R. The incremental information content of replacement cost earnings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 1982,(4): 15～39.

[11]Beaver William H. Financial reporting: An accounting revolution [M].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89.

[12]Bell, Timothy Barnes. Market reaction to reserve recognition accounting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1983,21: 1～17.

[13]Danbolt Jo, William Rees. Mark-to-market accounting and valuation: Evidence from UK real estate and investment companies [R]. Working Paper, University of Glasgow: Scotland, 2007.

[14]Dietrich J, Richard Mary S Harris, Karl A Muller III. The reliability of investment property fair value estimates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0,30: 125～158.
[15]Holthausen R W, Ross L Watts. The relevance of the value-relevance literature for 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 setting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1, 31: 3～75.
[16]Sloan R G. Evaluating the reliability of current value estimates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1999,26: 193～200.
[17]Watts R L. Conservatism in accounting part I: Explanations and implications [J]. Accounting Horizons, 2003,17: 207～221.
[18]邓传洲.公允价值的价值相关性:B股公司的证据[J].会计研究,2005,(10):55～62.
[19]黄学敏.公允价值:理论内涵与准则运用[J].会计研究,2004,(6):17～21.
[20]孙铮,刘浩.中国会计改革新形势下的准则理论实证研究及其展望[J].会计研究,2006,(9):15～22.
[21]王跃堂,周雪,张莉.长期资产减值:公允价值的体现还是盈余管理行为[J].会计研究,2005,(8):30～36.

The Analysis to Positive Research on Fair Value and Chinese Opportunities

LIU Hao, SUN Zheng
(*Institute of Accounting and Finance,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reviewed the western (especially American) and Chinese positive researches, and analyzed the Chinese scholars' research opportunities under the new accounting standards. Within the specific institutions, we believed the fair value, which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would have deep effects on the decision usefulness. In the western security markets, the value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is that the relation between accounting information and price of stock is closer, which is called information perspective. But we think that, in the transformational market economy, the Chinese researchers will make a great breakthrough in the contracts usefulness of fair value.

Keywords: fair value, positive research, value relevance, contracting usefulness

（责任编辑：金　澜）